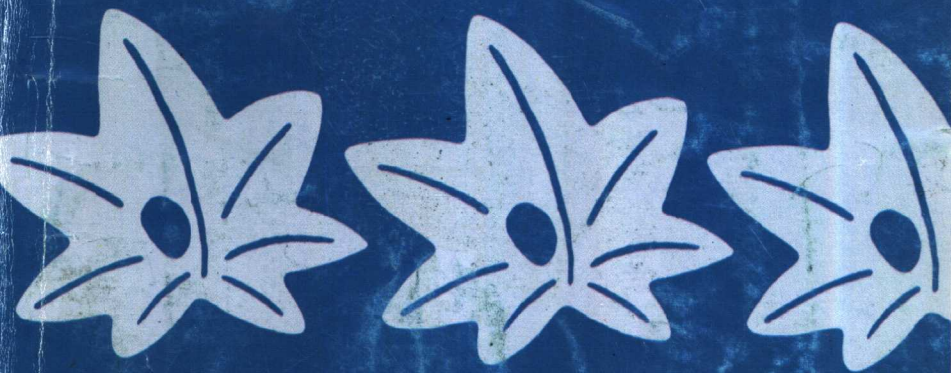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史丛书

茶酒神韵

—中国的茶酒文化

余世谦



沈阳出版社

茶 酒 神 韵

——中国的茶、酒文化

余世谦

沈阳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七年

中国文化史知识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张岱年

执行主编

朱立元

委 员

王振复 李祥年 周振鹤 葛剑雄

朱立元 涌 豪

总策划

石铜钧

责任编辑

封兆才 祝乃杰 葛君 田雪峰

封面设计

曾一中 庆芳

目 录

上篇 茶

- 一、中国茶业史 (3)
- 二、中国茶习俗 (16)
- 三、中国名茶录 (38)
- 四、中国茶文化 (55)

下篇 酒

- 五、中国酒业史 (81)
- 六、中国酒习俗 (95)
- 七、中国名酒录..... (112)
- 八、中国酒文化..... (124)

上篇 茶

一、中国茶业史

茶是中国人的“国饮”。

茶与咖啡、可可并称世界三大著名无酒精饮料。

与咖啡、可可相比，茶的历史最悠久、风行地区最广泛、饮用人数最多。现在，全世界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喝茶，茶叶已被举世公认为上品饮料，享有“绿色金子”的美誉。

中国是茶的发祥地，向有“茶的祖国”之称。世界各国，凡提及茶事者，无不与中国相联系。茶，是中国人的光荣；茶，是中国人的骄傲。

茶的起源

相传远在公元前 2737～前 2697 年神农氏最早发现茶树，并将茶叶用为解毒治病的药料：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tú，途。茶的古称）而解之”（《神农本草经》）。

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有“谁谓荼苦，其

甘如饴”、“有女如荼”、“予所捋荼”等关于“茶”的多处记载。中国最古老的词典、传说始于周公的《尔雅》中说：“槩(jiǎ, 甲。茶树的古名), 苦荼”, 意即茶树也就是苦荼。这些文献记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茶的文字资料, 它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的国家。

秦汉时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曾记载, “益州(今四川)川谷山陵道旁”的茶树, 其叶可治病。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说, 早在周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22~前1116), 参加征战的巴蜀等南方小国部落就有以茶叶作为“贡品”的了。东晋时常璩汇集前代史籍所著《华阳国志·巴志》一书中, 不仅记载了与《史记·周本纪》相同的这一内容, 而且还称这些小国部落“园有芳蒻(ruò, 弱。嫩香蒲)、香茗(míng, 明。茶的云南古称)”。在川谷、山陵、道旁的茶树属于野生的可能性较大, 而“园有”“香茗”则显然属于人为栽培的茶树了。晋代学者郭璞注的《尔雅》、诗人张载的诗中都有巴蜀产茶的记载, 至于后世所谓“蜀土茶称圣”的赞语那就更多了。这些文字资料说明, 中国西南地区是茶的原产地, 而且早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西周时期, 这里就已开始人工栽培茶树了。

在我国历史文献中, 唐代以前“茶”的名称有“荼”、“槩”、“葭”(shè, 设。茶的四川古称)、“茗”、“荈(chuǎn, 喘。最晚采的茶)等。唐代陆羽著《茶经》时, 将“荼”改写成“茶”, 统一了“茶”的命名。现在, 世界各国对“茶”字的读音, 都直接效法汉语的读音。比如, 目前世界各国对“茶”字的读音, 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系统, 即由中国广东话“Cha”和福建厦门话“Te”音译而成的。如俄语“Ча-й”、阿

拉伯语“Chai”、土耳其语“Chay”、葡萄牙语“Cha”、波斯语和印度语“Cha”、保加利亚语“Chi”等就是由广东话“Cha”拼译而成的；而拉丁语“Thea”、英语“Tea”、荷兰语及德语“Thee”、意大利语和丹麦语“Te”、法语“The”、瑞典语“Te”、新贺语“Thay”、塔木耳语“Tey”、芬兰语“Tee”、挪威语“Te”、世界语“Teoa”、拉脱维亚语“Teia”、捷克和斯洛伐克语“Te”、匈牙利语“Te”、朝鲜语“Ta”等则由福建厦门话“Te”拼译而成的。在日语里，不但读音与汉语相同，而且还借用了“茶”这个汉字。茶树最早的学名“Theassinensis”也就是“中国茶”的意思。字源考察研究的这些结果也充分表明中国是茶的故乡。

据资料记载，现在世界上所有产茶国家的茶树最初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输入的。公元805年，日本高僧最澄在中国研究佛学，携带茶种回国，成为日本种茶的开端；公元850年，中国茶叶传入阿拉伯；1559年，传入威尼斯；1567年，传入俄国；1598年，传入英国；1600年，传入葡萄牙；1610年，传入荷兰；1648年，传入法国；1650年，传入南美洲。中国茶叶传入东南亚各国时间虽然较早，但这些国家开始人工栽培茶树则较晚。如印度产茶始于公元1834年；斯里兰卡（锡兰）始于1867年；印度尼西亚始于1827年等。这些资料表明，中国是产茶母国。

中国不仅是茶的原产地、最早人工栽培茶树，是产茶母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最早把茶叶作为饮料的国家。公元前59年，即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在王褒佣人的卖身契约《僮约》中有“武都买茶”“烹茶尽具”的记载，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烹茶、买茶的最早的文字资料。武都，即今甘肃成县西，

是当时的产茶之地。这一记载指明茶叶在当时已经成为商品，客来敬茶，要把烹茶饮茶的器具预先准备好；证明当时饮茶之事已经成为富豪贵族的家常事了。据此可知，至少从西汉时起，茶叶就已经从古代解毒治病的药物开始转为款待宾客的饮料了。这实际上也就是世界饮茶历史的开端。

中国古代茶业

中国古代茶业素称发达。

茶叶历来是我国人民最重要的消费品之一和国家贸易出口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各朝历代都把茶业生产和贸易作为中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茶业生产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公元9世纪以前，茶业生产为中国所独有。20世纪以前，中国茶业生产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茶叶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古代茶树的传播首先是从四川传入陕西南部、甘肃和河南南部地区的，因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带。秦汉统一中国之后，茶树随着巴蜀人民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广泛交流而传播开来。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兴盛，提倡坐禅戒酒、讲法诵经；文人学士则崇“玄学”、尚清谈。饮茶可以驱睡、提神、解渴、充饥，于是僧侣道士、士大夫阶层饮茶之风盛行起来。这种饮茶风尚大大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但总起来说，隋唐以前的茶业生产在区域、规模、经营方式、产量和采制技术等方面都还是狭小、简陋、单一、少量和原始的。比如南北朝时期的产茶区域就主要限于

江苏、安徽、湖北、四川一带长江流域地区，茶树栽培也多数只是在名山寺院的近傍山谷之间，很少成片的茶山，茶叶加工也只限于饼茶的制作，即将鲜茶叶捣碎制成饼状茶。

隋唐时代，佛教道教盛行，僧侣道士倡行的饮茶之风上达宫廷王室、下至平民百姓，以至成为风俗，并且还传到了北方、西北和西藏等地。《封氏闻见记》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唐玄宗“开元中，泰山露严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山东兖州）、齐（山东青州）、沧（河北沧州）、棣（山东武安）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济，所在山积，色额甚多”。

公元760—780年间，陆羽撰写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全书3卷、10节、7000余字，论述了茶的起源、茶树品种、种植方法、产茶地区、采制技术、烹饮方法和器具以及从上古至唐代我国有关茶的历史记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古代茶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茶经》的流传，使“天下益知饮茶矣”，对茶知识的广泛传播和茶叶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陆羽也因此而被后人尊为“茶圣”、“茶神”。

陆羽（733—804年），一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出身贫苦，传说为一弃婴，3岁时被竟陵西坞寺积公和尚收养，为积公煮茶、做杂事。因喜爱诗文，不愿为僧学佛，备受积公劳役与折磨。13岁时逃离寺庙去当伶人，学习唱戏，才华出众。14岁时遇河南太守李齐扬，很得赏识，李除亲自教他做学问外，还介绍他去天门

北火门山向邹夫之求学，从而使他结识了当时不少有名的诗人和寺僧。安史之乱（755—757年）期间，他离开巴山峡川，决心终生研究茶事，在走遍茶叶产地32郡后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隐居苕溪（今浙江吴兴），闭门著书。20年后，写成《茶经》。

为了纪念这位“茶圣”，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陆羽家乡建造了“陆羽亭”。1957年重新建造，“文革”中受损，1981年再次重建。

唐代茶业生产较前有了较大发展，已经成为农村中重要的一项副业了。专门加工茶叶的焙制工场也渐次出现。民间茶园不但兴起，而且已有相当规模，有的每年要雇用采茶工200余人。一些大地主经营的茶园，采制茶工甚至多达2、3万人。唐代茶业生产还出现了中央政府的官营茶园。

由于茶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从唐代开始，政府对茶叶实行征税或专卖的政策法令——茶法，将茶业生产纳入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首先实行茶与竹、木、漆同收“什一（十抽一）之税”；贞元九年（793年）起，茶税变为独立的专税，将茶叶分等计价，按值计征，每十税一，称税茶钱。长庆（821年）时茶税税率增为15%，并改为按量计征；官府以弥补损耗为名，在应收税外再加收若干，以增加税收。文宗太和九年（835年），一度改税茶为榷茶（专卖），即将茶树的种植、茶叶的制造销售全部收归官营，不久作罢。唐武宗（841年）时开始，茶叶虽仍由民制商销，但官府课以重税，取走大部分茶利，并制定法律，严禁偷逃税收，以保障“正茶”商人权益。实际上此时已由税茶改为榷茶，属于间接专卖性质了。由于政府增税、加耗和地

方的横征暴敛，茶叶成为当时一种突出的重税高价商品。“私贩益起”，政府对私茶的处罚也日趋严酷，动辄处以死刑。

从唐代起，茶叶开始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重要商品。这突出表现在“茶马互市”的兴起。所谓“茶马互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西部和北部从事畜牧业经济的少数民族用马匹等牲畜和畜产品，与内地换取茶叶、布匹、铁器等生产、生活用品的比较集中的大规模集市性贸易活动。开元十九年（731年），占据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要求与唐划界互市，提出交马于赤岭（今青海湖东岸日月山）、互市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唐政府允许交马互市均在赤岭。输往北方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汉中地区。

唐代茶叶产地已经很广，据《茶经》记载，当时全国已有八大茶区，江苏、安徽、江西、四川、湖北、浙江、福建、广东、云南、陕西、河南等省都是茶叶产地，已与现代茶区分布相近。

在茶叶加工制作方面，这一时期进一步完善了饼茶制作技术，并且出现了将鲜茶叶，先蒸后捣制作团块茶的技术。由于对制造技术掌握不同，茶色有绿、黄、黑，于是产生了绿茶、黄茶、黑茶的名称。

宋代，佛教趋于衰落，道教却超过隋唐时代。宋徽宗就曾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当时从京城到全国各地遍设道教宫观。这一时期，揉佛、道于儒的“理学”兴盛起来，理学家大多热衷于“性”“命”“义”“理”的高谈阔论。因此，宋代“饮茶论道”“烹饮品茗”之风比起隋唐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茶业较唐代有所发展，茶叶中心由东南移，特别是

福建、浙江两地的茶叶生产发展尤快。当时的福建建瓯、建阳、崇安一带的官办与私办的茶业作坊约有 1000 多所，雇用大批茶工从事茶叶采制。据《宋史·太宗本纪》记载，当时福建上交官府的输税茶叶就有 19.6 万余千克，浙江更多，为 64 万余千克。

宋代茶法与唐末基本相同，但也时有增损。北宋的茶叶除淮南实行官卖和四川广南不实行专卖（但不能出境）外，其他地区都实行通过商人运销的间接专卖制度。园户（茶农）所产茶叶，部分折交租税，留少量自用，其余均以低价卖给官府，私卖者判以重罪，交售时要负担 20~35% 的损耗，对官府预付的本钱要付 20% 的利息，官府以高出原价 1 至数倍的价格，将茶转卖给茶商，茶商缴钱后，凭所发“交引”（商业执照）提货，在官卖以外地区销售。有时，商人在边沿地区交纳粮草，官府按优待价折付茶叶，此称“入中法”；若以现钱购茶，则称“现钱法”；后来又有所谓“贴身法”，即商人出钱向园户买茶，官府坐收进销差价，并且不再向园户预付本钱。北宋中叶，茶法变化较频，但都是官府与商人争夺茶叶利润的反映。由于私贩盛行，官茶陈积，园户隐匿好茶以示反抗，榷茶之弊日深。到仁宗嘉祐四年（1059 年），决定取消茶叶专卖，实行通商法（福建除外），即将原茶税收率减低后均摊于园户身上，园户纳租钱后可自由卖茶，商人交纳茶税后可直接向园户买茶，不受官府干涉。通商法促进了当时茶叶的生产和正常流通。北宋末年，蔡京（1047~1126 年）当政，厉行官府专利政策，废除通商法，实行“引卖”制，即商人缴钱购买“茶引”（商业执照），再凭“茶引”向园户购茶，由官吏监督当场称发。“茶引”价钱很高，由官府净拿，

买茶另外自付茶价。盛茶的竹篓由官府专制，严密封印，使用私制竹篓者以私茶论处。这是一种“商专卖”（委托专卖）的形式，严格的引卖制度由此开始。

宋代，“茶马互市”有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随着饮茶风尚的传播，边外地区对茶叶的需要量大为增加；另一方面，边外地区，主要是北方和西北地区出产的良马又为内地军队装备所需要，所以，“茶马互市”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繁荣起来。与此同时，北方相继出现了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夏、金政权，长期与宋作战，威胁着宋的安全。因此，宋王朝也注意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先是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各置榷茶买马司，经办购运川茶赴秦、凤（今陕西凤翔）、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换马。后来又改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全面负责茶马交易与市场监管。《封氏见闻记》中曾对宋代饮茶风尚的传播和“茶马互市”情景作过这样的描述：

“古人亦饮茶，但不如今日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经年回纥（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

北宋时，茶叶加工出现蒸青散茶技术，使茶的真味和本色得到保持。南宋时又发明了炒青散茶，进而发展到黄、黑散茶，技术日益提高。窨（xūn 熏，同熏）制花茶也出现了。

元代茶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西北茶叶市场的开放上。西北茶市的开放，使饮茶风气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间更为普及，从而促进了边茶的大量生产。

元代茶叶专卖仍旧用宋代的“引卖”制度；并且实行高价重课政策，甚至还以增发“茶引”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

明代茶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制茶技术的提高和茶叶质量上的改进以及诸如《茶疏》（许次纾）、《茶谱》（顾元庆）等一批茶叶专著问世。比如这一时期鲜叶锅炒、高温杀青、揉捻、干燥的炒青制茶方法已经相当普遍，还发明了红茶制法，开始生产小种红茶等。

明代茶叶在内地的销售仍旧沿用前代卖引之法，只是茶税较轻，茶课收入因此也较前代大减。这一时期，茶叶专卖“只严于边市”的“茶马互市”贸易之中。比如明政府在西宁、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等西北边地重镇就设置茶马司，在北部的宣府、大同、张家口和东北的广宁（今辽宁北镇）、开元、抚顺等地也设有茶市、马市，推行严格的茶叶征税法和马匹摊派法，规定交易双方必须在固定的官市上按照官定的茶马比价进行交易。如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的交换比率为：上等马1匹，换茶60千克，中等35千克，下等25千克。弘治三年（1491年）则为：上等马1匹，换茶50千克，中等40千克。由于茶贵马贱，这种“茶马互市”实际上成为明王朝的一种“以马代赋”制度，用以控制、剥削少数民族，并攫取战马。人民不堪忍受这种盘剥与限制，于是在辽东、内蒙古、甘青、川康一线数万里沿边地区，纷纷进行自由贸易，这就是所谓的“私市”。官府起初对这种“私市”严加取缔，但后来被迫认可，改称“民市”。

明代起，中国茶树栽培技艺开始西传欧洲。

清代，饮茶盛况空前。人们应酬、交际、送礼都已离不开茶。茶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已经成为每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了。

清代茶业生产直至19世纪末还是在发展的，特别是鸦片

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以掠夺中国茶叶为目的，使华茶出口外销量激增。商人买办到处抢购运销，刺激了茶叶生产，茶叶购销一度兴盛。据资料记载，在此期间，全国种茶面积达六、七百万亩，产量达15—20万吨，中国仍然雄居世界第一产茶大国的地位。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剥削的侵略政、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以及欧亚新兴茶叶产国的崛起，20世纪初开始，中国茶叶生产迅速萎缩。

清代初、中期，“茶法”仍旧沿用以前的“引卖”制度，但控制日益放松，课税也不太重；后期则完全废止了茶叶专卖制度，改由民间自由经营。

由于货币制度的发展和畅行，以货易货的交换方式不再适应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变化，所以传统的“茶马互市”到清代已不再繁荣，政府采取了不再征收牧民马匹和允许民间自由贸易的政策，延续近千年的“茶马互市”制度遂告终结。

清代，各种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紧压茶的加工制作技术相继出现和成熟。

这一时期，中国茶叶大量向欧洲，特别是向英国出口，中国茶业技术继续迅速外传。

中国现代茶业

中国现代茶业历经艰难。

20世纪初起，茶叶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新兴产茶国茶业生产迅速发展，而中国则进入军阀混战、内乱不已的动荡年代。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和国内战乱困境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茶业生产倍